

# 战争、思想与秩序：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政策与活动（1937～1941）<sup>\*</sup>

吴婉惠

【摘要】七七事变后，中国国内民众掀起抗日运动高潮，远居海外的华侨也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日。在日本看来，能否获得南洋华侨的合作与支持，就成为解决日本侵华战争和南进的重要课题。为动员一切有利因素支持战争，日本在对中国国内民众全面展开宣传的同时，也将华侨纳入其战争宣传体系。日本制定了详细的对华侨宣传方针和政策，在华侨居住地、华侨故乡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宣传促使华侨对蒋介石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抗日产生悲观和失败主义情绪，打击华侨的抗日热情，进而在经济上切断华侨对祖国的援助，在思想上营造亲日氛围，并试图通过稳定海外华侨达到稳定其在华侨故乡统治的目的。日本对华侨的战争宣传是日本侵华战争过程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七七事变 南洋华侨 宣传政策 宣传活动 大东亚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5-0127-11

近代日本开始真正有意识地进行战争宣传始于中日甲午战争。<sup>①</sup>日俄战争和一战又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战争宣传的认识和实践。一战后，日本紧随欧洲各国掀起一股研究宣传的热潮。<sup>②</sup>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宣传对象的重点才由西方各国转向中国，并随着在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制定出不同的宣传政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作为中日战争中的独特存在，对双方都有莫大的意义。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抗日运动高潮，华侨也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在日本看来，能否获得南洋华侨的合作与支持，就成为解决侵华战争和日本南进的重要课题。因此，远居海外的南洋华侨被纳入日本的战争宣传系统。

关于抗战时期华侨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成果丰富，不胜枚举。总的来说，南洋华侨研究多以抗战史为切入点，主要集中在华侨团体、个人对抗战的（经济）支援和华侨的抗日活动（如抵

<sup>\*</sup> 本文系2018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近代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政策与活动（1931～1945）”（项目编号GD18YHQ01）的阶段性成果。

制日货),以及日本对南洋华侨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与压制等,<sup>③</sup>未将重点置于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上。日本学术界则往往将南洋华侨问题置于日本南进政策形成过程中研究,以及日本在东南亚的军政制度上,尤其是其在经济层面上的角色。<sup>④</sup>即便是关于日本宣传史的研究,也只是概述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宣传政策,<sup>⑤</sup>而未对当地华侨做个体研究。<sup>⑥</sup>欧美学界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宣传活动的研究亦不在少数。不过这类研究大多只关注日本对东南亚民众的宣传方式,南洋华侨群体始终未能成为宣传研究的独立对象。<sup>⑦</sup>深入战时日本对南洋华侨宣传政策的研究,有赖于继续全面搜集、整理和翻译相关史料,梳理相关事实。本文以日文一手档案及其它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据,考察七七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政策和活动。

## 一、南洋华侨对抗战的支援

相对于“大陆生命线”(即“满蒙生命线”),近代日本将南洋称为“海洋生命线”。<sup>⑧</sup>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sup>⑨</sup>明确提出“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sup>⑩</sup>一战后,日本获得德国在南洋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对南洋和南洋华侨的研究也随之得到更多重视,“日人之赴南洋者既已日众,调查南洋之出版物亦日以富”。<sup>⑪</sup>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方面不乏加强建设“海洋生命线”的声音。“所谓海洋生命线,即在南洋一带构筑国防线,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之国策。”<sup>⑫</sup>对日本而言,想要构建所谓的“海洋生命线”,则必须南进;想要南进,则必须解决在南洋势力庞大的华侨之相关问题。《南洋华侨丛书》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南洋华侨在日本扩张道路上的重要性。“南洋华侨,其数已达七百万,占华侨人数过半之多。今后,建立新亚细亚也好,我国之南洋贸易以及南洋方面经济开发等问题上也好,都与南洋华侨关系密切。从这个层面而言,南洋华侨不仅仅是我们的协助者,其经济乃至社会地位不可忽视”。<sup>⑬</sup>七七事变前,日本主要关注点在中国国内,宣传对象也以中国国内民众为主,对身处南洋的华侨并未形成系统的宣传政策。七七事变后,一是由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统一战线形成,南洋华侨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二则由于日本陷入战争长线,不得不多方面(如加快南进)寻求解决中国战争的道路。因此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关注和宣传迅速高涨。

日本认为,南洋华侨在经济和舆论上的支援是蒋介石政权得以存续、抗战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七七事变爆发后,南洋华侨当中掀起一股拒买日货和积极捐款的浪潮。“这种抵制日货活动,不仅包括拒绝贩卖日货、消费日货、运输日货,而且还扩大到与日本各行各业的各种交易、日本矿山的罢工活动”等。<sup>⑭</sup>保守估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军费1/3是华侨捐献的。<sup>⑮</sup>南洋华侨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因此当战火向中国南方蔓延时,南洋华侨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气氛迅速升温。“敌人的炮火既然向着两省射击,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闽粤省籍的海外华侨,他们无论为着救助桑梓的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的完整,抑或为着救助桑梓的家属亲族乡党乡里的安全,均将格外负起援助祖国保卫闽粤的责任。”<sup>⑯</sup>这些华侨往往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商业地位,他们开展抵制日货、筹款救国运动,给日本方面带来相当程度的打击。据日本资料记载,在事变发生初期,法属印度支那华侨的反应令人意外地温和。然而随着战火向华中、华南地区蔓延,当地抗日情绪顿时激烈起来,因为当地华侨大多皆来自南方地区。特别是华侨青年发起声势浩大的拒买日货活

动。<sup>①7</sup>又如以粤籍潮汕人为主的泰国华侨，当战火波及华南时，排日气势迅速高涨。占华侨人数绝大部分的福建人得知故乡厦门沦陷后，其反日情绪也极端高涨。<sup>①8</sup>日本入侵福建、广东，进一步触动南洋华侨对故土的牵挂。由于华侨在南洋拥有绝对的经济优势，华侨抵制日货活动给日本的南洋出口贸易带来相当的打击。日本强调“为加强和发展我国与南洋各地的经济依存关系，共享共存共荣之成果，绝不可忽视和华侨的关系。”<sup>①9</sup>

除了经济支援，南洋华侨在抗日宣传上也是不留余力。华侨的抗日宣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华侨群体的宣传，团结华侨一致抗日；二是对国际的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如利用报纸积极刊登国内战事消息，呼吁华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日本就曾抱怨新加坡华侨发行的中文报纸《星洲日报》刊登的排日新闻有时比中国国内还要激烈。<sup>②0</sup>七七事变后的10月10-16日，新加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南侨筹赈代表大会”，除讨论筹款问题外，也对今后具体的华侨宣传工作和方法进行讨论。<sup>②1</sup>南洋华侨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宣传活动，通过报纸、杂志、话剧、演讲、歌咏、联谊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战的意义和必胜的信念。如《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等都专辟宣传抗日的副刊，《南洋月刊》《文艺长城》《青年月刊》《学习青年》等杂志发表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文章；柔佛峇株巴辖区赈灾会设立宣传部，每逢集会和抗战纪念日，都以各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各地华侨华人话剧社组织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演出，深受侨民欢迎。<sup>②2</sup>

国际宣传上，“鉴于华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语言上的技巧，他们显得尤为重要”。<sup>②3</sup>有人提议华侨在抗战纪念日举行各种宣传活动来获得外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例如从事工商业的侨胞，可商定一日为感谢外人“援华抗战”的纪念日，以半价出售商品，表示对当地政府及人士之感谢。<sup>②4</sup>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华侨还通过办报等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sup>②5</sup>华侨的宣传活动有力促进了抗战运动的发展，正如《动员华侨问题》一文所说“我们动员华侨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他们能成为在外从事国际宣传和进行国民外交的‘战士’。”<sup>②6</sup>

日本十分担忧华侨对国内抗战的经济援助和抗日宣传问题“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八百万人，每年向国内输入约三、四亿元资金，是抗日蒋政权有力的财政来源之一。同时，这些华侨也扮演着抗日宣传战战士的角色”。<sup>②7</sup>国民政府积极的华侨政策和宣传活动亦让日本深感压力，“事变以来，蒋政权对华侨开展了积极的宣传，尤其将重点放在南方诸国约620万的华侨身上。以重庆侨务委员会为中枢，对一般华侨团体、乡党团体、职业团体及文化团体等开展动员活动。”<sup>②8</sup>日本判断“随着作战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南支方面的人心动摇，南洋华侨亦会对故国抱有不安。（日本）应趁机让这些华侨丧失对蒋政权的信赖，促进其对日依存的观念，转向支持新政权。这不仅是溃灭蒋政权的手段之一，也是强化新政权的有力原动力。”<sup>②9</sup>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不仅是日本民众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南洋华侨也是日本开展宣传活动的对象之一。

## 二、七七事变与日本《对华侨宣传方针》

面对七七事变后华侨对抗战的种种支持，日本除武力镇压和经济打击外，同时也将华侨纳入战时宣传系统，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日本战争宣传，以东亚新秩序的提出为界限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7月至1938年11月，即七七事变爆发至东亚新秩序的正式提出。这期间，日本宣传以解决七七事变及后续问题、强调日本对华

战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核心，其主要论调是将责任归咎于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中国“赤化”的威胁，促使华侨对蒋介石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对抗日产生悲观情绪。

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制定《日本华北驻屯军关于七七事变的宣传计画》<sup>③</sup>、第三次和第四次《关于支那事变之宣传方策大纲》<sup>④</sup>等宣传政策和方针，奠定了事变后日本内外宣传的基调。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情报部颁布《对华侨的宣传方针》，更是奠定了该时期对华侨宣传的基本策略。该方针称“以全世界华侨为对象，然鉴于目前之形势，则以南洋华侨为主。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蒋政权丧失信心并与新政权合作”<sup>⑤</sup>。

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该方针制定了七项详细的宣传内容：

1. 强调我国有毫不动摇之决心，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不达事变所期之目的誓不罢休。
2. 纠正华侨对支那国力过于自信，对日本实力过于轻视的错误认识。
3. 支那的长期抗战只会让百姓陷于涂炭，从而导致支那的崩坏、遭受赤化的惨祸。
4. 介绍战局的真相，以及北支、中支及厦门等其他南支沿岸岛屿之明朗化实情。
5. 展示蒋政权正濒临没落，而新政权正逐渐强大的事实。
6. 华侨捐款予蒋政权以援助，不会给华侨带来一点利益。
7. 依靠前面宣传内容引导华侨支援新政权。<sup>⑥</sup>

为阻碍华侨对国内的援助以及对日本的抵抗，日本在宣传上注重强调日本的决心和实力，展示蒋政权的没落，使华侨对抗日丧失信心。同时，大力鼓吹新政权的成立，并引导广大华侨支持筹划中的伪政权。由于抗战第一年中国的不利战况，以及华侨本身面临居留国的诸多压迫，部分华侨对抗日的前景表示担忧。《满洲日日新闻》就报道称华侨抗日热情骤减“蒋政权长期抗日作战……与其宣传相反，常常败战。……蒋政权被逼向西南山岳地带，堕落成为地方政权。华侨知晓上述实际情况后，一时热情骤减。再加上居留国政府的压迫，今后蒋政权欲期从他们那获得财政支持恐是难上加难”<sup>⑦</sup>。日本抓住此种心理，开展针对性宣传，以使他们丧失对蒋信心。不仅如此，日本还利用“通州大屠杀、毒气事件、黄河决堤事件”<sup>⑧</sup>等向华侨宣传，以动摇华侨对蒋介石政权的信心。董显光在回忆录中也曾反映，抗战初期部分华侨对未来表示担忧，对抗日失去信心。<sup>⑨</sup>然而从各地华侨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和募捐报国等活动来看，绝大多数华侨依旧坚定不移地支持祖国抗战。

为扩大宣传效果，日本在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置广播业务，收买报纸，利用中国国内亲日分子对华侨进行宣传。日本档案中清清楚楚记载了日方如何致力于与相关报纸主编“沟通”，让其刊登有利于日本的新闻。<sup>⑩</sup>同时还在占领区施行“迅速恢复华侨出生地治安”工作，以吸引华侨归国定居，为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并通过日本成立的侨务团体进行宣传等。具体事项如下：

1. 进一步强化东京、台北及上海放送局对华侨宣传。启动厦门放送局业务，对福建地区进行广播。
2. 收买南洋及厦门方面的报纸，经营我方发行的报纸的同时，强化该地同盟通信社机构。
3. 宣传实施上，对华侨的通信加以利用，我国驻外机构进行相关指导。
4. 通过我方对华侨出生地的公正施策，使避难者中的有力阶层迅速回归。
5. 谋求利用与华侨关系密切的亲日支那人的同时，在南洋主要地方开展成立以支持新政权及日支合作为目的的华侨团体。
6. 利用照片、电影及杂志等，介绍时局之真相及华侨生活地的实情。
7. 民间各团体制作的各宣传文书，应止于记载事实及分析利害的层面，避免使用引起华侨反感的记述和刺激华侨情感的语句。
8. 进一步加强台北、上海、香港、厦门及南洋各地的驻外机构与中央之间的联络，以及其相互间的联络。<sup>⑪</sup>

福建是日本南进的重要据点，也是南洋贸易的重要港口，以及众多华侨的故乡。1937年6月，日本在厦门成立治安维持会，计划建立“王道乐土”。厦门自然而然也成为日本开展对华侨宣传的重要区域。日本计划“启动厦门放送局业务，对福建地区进行广播”。此外，日本还通过收买、控制南洋及厦门报纸的方式，控制福建百姓与华侨通信内容的形式，开展对华侨的宣传。为维持和发展日本占领区的经济，利于其进一步推行扩张政策，日本通过向华侨宣传其占领下的华侨故乡之明朗、稳定，积极鼓励和吸引华侨归国。1938年10月，为“冀收日华及南洋亲善提携之效”，<sup>⑨</sup>军部与台湾总督府在厦门设立“厦门共荣会”。“厦门共荣会”以“与华侨合作或交流南洋信息，扶持各种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提出要“通过电影宣传和教化”“宣传佛教”、开设“私立日语补习所”等方式来达到“日支合作”目的，<sup>⑩</sup>指向性和目的性十分明确。鉴于华侨乡土观念特别强烈，日本一直重视“在皇军占领区努力进行宣抚工作，通过华侨在家乡的亲友号召华侨”。<sup>⑪</sup>“宣传两头开”是日本对南洋华侨开展宣传活动的一大特色。日本占领汉口、广东后，逐步通过控制当地人民寄给海外亲人的信件来影响海外华侨对形势的判断。《大阪朝日新闻》对此报道“随着汉口、广东等皇军占领地治安的恢复，当地百姓通过信件直接向他们传达了皇军俨然有序和慈眉善目的信息。华侨得知他们的故乡如今比国民政府统治时还要安宁、和平，皆感大惊，遂由惊转喜。华侨全都觉悟到最近的排日、拒买日货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开始对日本人态度好转”。<sup>⑫</sup>日本的这一报道明显带有夸张和虚假的成分，实际上日本占领厦门后，多数华侨的反日情绪更加激烈。

为达到宣传的良好效果，外务省情报部还印刷了大量针对华侨的传单和小册子，通过日本驻外公馆散发给华侨。<sup>⑬</sup>如印制名为“敬告旅居海外的华侨诸君书”五种，每种各200,000份，以离间华侨与国民政府及共产党之关系。<sup>⑭</sup>驻南洋各地的日本对外公馆也强调“致力于和当地有力者进行不断地接触，以防止发生排日、排日货运动。通过报纸、杂志、广播、演讲等散播有利于日本的消息。”<sup>⑮</sup>事变初期，日方在研究南洋华侨的对日态度后认为，许多上层华侨的对日态度较为温和，普通华侨反日情绪高涨，而下层华侨则最为激烈。因此，通过动员和说服上层华侨，则有可能在经济和对日态度的转变上获得成功。此外，日本认为利用华侨侨居地的舆论机关进行宣传工作，也能有力促进华侨抗日潮流的转变。<sup>⑯</sup>《支那事变情报宣传工作概要》中记载了日方宣传用半月刊杂志《民心》，“1937年12月中旬第一辑印刷了一万份，引起极大的反响。之后增印至一万五千份，进一步充实内容的同时，销售范围也扩展至各租界的报纸卖场，以及占领地各城市。此外在支那地方上也获得好评，不少支那人希望能购买到。（1938年）7月末购买数已达到8,500份。这份杂志在宣抚工作和对华侨宣传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暹罗华侨用此分化抗日团体”。<sup>⑰</sup>可见，日本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上打击中国，在宣传层面上也是全面展开积极活动，动员一切有利于日本的因素支持其战争，甚至连华侨也被纳入其宣传范畴。

### 三、大东亚新秩序的提出与对南洋华侨宣传

大东亚新秩序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迈入新的阶段。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便武汉、广东相继失守，中国军队也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对日长期作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也进一步高扬。近卫内阁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放弃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恫吓，继而抛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诱饵，以图诱降蒋介石。<sup>⑱</sup>对国名党正面战场实行以诱降为主，进攻为辅的“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sup>⑲</sup>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打出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希望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1938年12月22日，近卫内阁公开正式发表宣称战争目的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sup>⑤</sup>日本宣称“面向中外的近卫声明发表后，事态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从单一的日中之间的战斗一跃发展为打开东亚一体的新秩序的建设……这次圣战有了进一步的跨越，应当超越东亚，去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中日之间的战争也“从与蒋介石的对抗迅速发展为在东亚新秩序下的世界性宣传。”<sup>⑥</sup>伴随整体战略的调整，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策略也做出相应变动。因此，以东亚新秩序的提出为始，珍珠港事件爆发为节点，日本的战争宣传也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在战争宣传理论上提高到了新的层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新的解释和目的，即日本不是为自身而战，是为建立共同的大东亚新秩序而战。

从内容来看，东亚新秩序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延伸和扩展。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行动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那么东亚新秩序的提出则显示出日本已不满足于打破旧秩序，而是要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建立“东亚新秩序”仅仅是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步。<sup>⑦</sup>近卫内阁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一方面与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日本的极端不自信，日本想要通过宣传建立共同的东亚新秩序来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新秩序口号提出后，日本在宣传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宣传政策——《东亚新秩序宣传方策大纲》，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内涵和实现方式。<sup>⑧</sup>为了引起民众对东亚新秩序的关注，日本举办了诸多活动，如从1939年3月3日开始，日本政府与华中驻屯军相呼应，在日本和中国各地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东亚新秩序运动周”活动。<sup>⑨</sup>

东亚新秩序提出后，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以介绍大东亚新秩序为主旨。在宣传手段上，努力“阐明大东亚战争的目的，缓和南洋华侨的反日情绪”。同时，在“福建和广东侨乡，采取保护良民、维护治安等特别工作”。<sup>⑩</sup>对此，作为南洋华侨研究主要承担者之一的台湾拓殖调查课认为“所谓华侨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南洋华侨问题。对如此庞大和富有的南洋华侨，今后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使其理解我方坚定不移的方针，投向亲日阵营。”在具体的方策上建议：

(1) 这些华侨同乡间的社会凝聚力相当坚固，即使自己的家乡已经被日军占领，其反日情绪深埋在心里，可能难以化解。这样，日本方面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对福建和广东两省良民的宣抚工作。如果能使他们彻底理解这次圣战的目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和确立东洋持久和平的真正意义，与适当的宣抚工作相伴而来的，必定是南洋华侨逐渐显露亲日的倾向。(2) 在华侨家乡的华南各占领区，开展针对华侨的特别工作，例如保护良民、维持治安、与华侨通信联络等等，努力缓和他们的感情。然后，考虑与华侨的合作问题。此种基础性的工作是需要相当时日 and 不懈努力的。<sup>⑪</sup>

日本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政府，“名正言顺”地开展“中日合作”，实现大东亚新秩序。自兴亚院建立至1940年底，其最重要的工作及功绩便是诱降汪精卫并参与建立“新国民政府”事宜。<sup>⑫</sup>这一阶段的日本宣传重点在于宣扬东亚新秩序，宣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和汪伪政权的合法性。为此在具体实践中，日本方面提出诸多“改变华侨对日态度的实际手段”，如“当汪兆铭发表广播演说时，立刻将该演说印刷成为小册子，发送给南洋华侨知名人士”；“在广东建立强有力的无线广播电台，播送能够压倒重庆政府广播的丰富节目，通过新闻、讲演乃至娱乐方面的节目，改变南洋华侨对日本的概念”等等。<sup>⑬</sup>然而，正如日人感叹“中国人民支持日本政策的仅系‘新政权’的主脑部及‘了解日本政策的一小部分居民’而已，大多数人民仍忠于

‘蒋政权’，这决不是物力所能解决的……中国人民在国民政府的长期训练下，已具备了民族自觉心，如何使他们不误解‘东亚新秩序’的意义，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up>59</sup>1939年12月4日，为制造汪精卫伪政权合法性的舆论，内阁情报部便已颁发《关于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宣传方针》。<sup>60</sup>日本了解宣传主体的重要性，对华侨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来自中国的宣传。因此，该《宣传方针》规定对华侨的宣传主要通过“新政府”采取措施，目的是要确立汪精卫伪政权在华侨心目中的正统性地位。但是，日本在宣传要领中却已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汪精卫伪政权的傀儡性质：要求其在对华侨宣传过程中宣扬“皇军武力足以压制敌人（即蒋介石政权），敌军节节溃败，抗战能力大为消耗的事实，以及皇军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持续作战的优越性。而蒋介石方面必将陷入物质精神皆匮乏的地步”，要求汪精卫伪政权“其一要把握支那民心，此外要溃败重庆方面的抗战意志”。<sup>61</sup>大东亚新秩序提出后，日本对华侨的宣传由原来争取其放弃支援祖国和抗日为主，转向说服其放弃抗日的同时，诱导其进入到共同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当中来。

1940年6月29日，当法国投降德国之后，有田外八郎相向全国发表了《国际形势与帝国的立场》的广播演说。<sup>62</sup>这是日本自1934年“天羽声明”、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国际形势下，又一次表明其亚太政策的目标。<sup>63</sup>它表明日本要排除欧美势力，在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地区建立“新秩序”。<sup>64</sup>同年8月1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松冈外相在与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把“大东亚新秩序”改为“大东亚共荣圈”。继此之后，日本将战争目的修改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sup>65</sup>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提出后，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为主体的宣传在强调其与东亚各民族的联系性的同时，极力将西方各国的影响排挤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前后，日本对南洋和南洋华侨调查研究的数量达到顶峰，这与日本的南进政策息息相关。各种报纸、杂志、书籍都反复而热烈地展开对“南方”文化工作、宣传工作相关的讨论。<sup>66</sup>1941年3月，参谋本部第一研究班提交了《南方作战中占领地统治要纲提案》，对占领地在留华侨政策提出以下建议“正确评价地方经济机构实力。首先要一扫华侨对我方华侨政策的不安感。对留守者采用怀柔利用之策，同时策划吸引逃离的上层华侨复归，以此快速恢复经济机能，并根绝援蒋行为。为此，首先，对煽动推动抗日援蒋活动的重要政党组织，需进行处理。将之芟除后，成立支持南京政府的政党指导组织，使之成为表面运动的主体，回应我方实效性的华侨政策，进而达到操纵华侨的目的……占领初期，留下来的多为下层阶级，虽然他们价值不大，然而也要爱护之，以此来促进上层华侨的复归”。<sup>67</sup>从上述提案来看，对日本而言，华侨是解决“中日战争”的重要一环。同年7月10日制定的《华侨对策要纲》中提出“为有助于处理支那事变，同时执行帝国之南方政策，在东亚共荣圈内利导华侨，渐次由援蒋引离之，共同协助帝国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工作”。在具体宣传工作方面强调以“介绍日本国力、东亚的解放、轴心国方面的优势、对重庆政权内部实情及政策的批判等”为主题，通过“扩充通讯网，利用报刊、杂志、电影、无线电广播，招徕华侨视察团到日本、支那视察”等方式来达到目的。<sup>68</sup>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便已经制定《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并进一步讨论对华侨政策“诱导其背叛蒋政权，赞同、协助我方之施政方针”。<sup>69</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制定新的《华侨对策纲要》，“将华侨引离蒋政权，使之协助我国快速完成大东亚战争，发挥积极作用”。<sup>70</sup>日本对华侨的宣传也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新的态势。

## 结 语

日本深知在实现建立新秩序的道路上,除了武力战外,必须开展宣传战,“将重点放在思想战的指导上,有必要在思想战上取得胜利”<sup>①</sup>,才能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新秩序。然而,近代日本对南洋华侨的战时宣传政策充满了“断裂性”“矛盾性”“独裁性”“混乱性”等特征。首先,日本宣传的“断裂性”表现在其“持续性”的缺乏上。现代宣传是一种持续一贯的努力,<sup>②</sup>日本对南洋华侨的研究虽然起点颇早,然而这些政策导向性特点明确的研究,未能形成系统而持续性的宣传理念和框架,往往随着战争形势和战争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毫无铺垫的修改,没有从根源上把握南洋华侨的民心。其次,日本宣传与南洋华侨所看到的所在地事实、国内的实际情况等反差巨大,因而南洋华侨必然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日本在中国和在东南亚言行上的不一致性等问题带来了其宣传上的“矛盾性”。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将战争目的定义为“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然而其在东南亚的行动已经远远超过“自存自卫”的程度。<sup>③</sup>第三,日本在南洋实施的是军政制度,即日本军的独裁体制。日本军政独裁体制,导致其在宣传上的“独裁性”。对日军而言,其最大的目的是获取资源,因此行政上以及宣传上的能力相对不足。最后,日本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常常陷入混乱。日本对南洋华侨和侨乡“宣传两头开”的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两地的宣传内容,然而日本中央情报宣传机构和在地宣传机构之间的矛盾同样也反应在宣传上,导致了宣传的“混乱性”。从南洋各地日益兴盛的华侨抗日运动来看,日本的宣传活动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总体宣传进入新的阶段,其范围更广,针对性更强,迈入了世界性的宣传。然而,日本在加强对英美宣传的同时,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却由于军事、经济等原因流露出一种力不从心感<sup>④</sup>,并逐渐走向衰落。

由于资料所限,本文未能对日本对南洋华侨宣传的效果问题做出系统的分析,这是本文明显不足的地方,有待下一步搜集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敬祈见谅。

①关于近代日本早期的宣传活动,可参考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東京:研文出版,1994年。

②1931年之前,日本关于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顾及总结一战期间欧洲各国的宣传概况,并初步提出了对宣传在战争中作用的想法。如内務省警保局《独逸プロパガンダの研究》,1918年;常田力《人類の新なる欲求》,正文社,1919年;赤松寛美《現代及将来の戦争》,偕行社,1925年;清水盛明、大宮橋尾編《国防》,星野書店,1926年;小西鉄男:《プロパガンダ》,平凡社,1930年;レーニン著、青木俊三訳:《アジテーションとプロパガンダ》,共生閣,1929年,等。

③参见郭梁《二战时期日本“军政”的华侨政策》,黄小坚主编《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赵

晓红《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宣传战》,福州《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

④参见飯島涉編《華人・華僑史研究の現在》,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濱下武志《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VoMinhVu:《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期の仏領インドシナにおける日本の華僑政策》,《年報地域文化研究》(14)、2010年;Hermawan Eddy《日本軍政期の西部ジャワにおける華僑政策》、《社会科学討究》28(2)、1983年;蔡史君《日本南進における文化工作論と華僑政策—“台湾本島人利用論”を兼ねて—》,《重点領域研究総合的地域研究成果報告書シリーズ:



総合的地域研究の手法確立：世界と地域の共存の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27，1996年。

⑤参见加納寛 《日本の宣伝活動に対するタイの反応：1942～43》，《現代中国研究》(33)，中国現代史研究会，2013 《戦時下日本による対タイ文化宣伝の一断面 〈日泰文化〉 刊行をめぐって》，《中国21》(31)，2009年。

⑥参见栗屋憲太郎 《太平洋戦争期の日本の宣伝政策》(歴史学と国際交流〈特集〉)，《歴史学研究》(495)，1981年；井上祐子 《戦時グラフ雑誌の宣伝戦：十五年戦争かの“日本”イメージ》，東京：青弓社，2009年；織田康孝 《日本軍政下ジャワ島における占領地統治構想とメディア：朝日新聞社？軍政監部？宣伝班》，《メディア史研究》42，東京：ゆまに書房，2017年，85～111頁，等等。

⑦如 Aiko Kurasawa, Propaganda Media on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1942 - 1945), in *Indonesia*, Volume 44, October 1987, pp. 59 - 116; Grant Kohn Goodman, *Japanese cultural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⑧如志賀重昂全集刊行会編 《志賀重昂全集》(第3卷)，志賀重昂全集刊行会，1929年；竹越与三郎：《南国記》，二酉社，1910年。

⑨今井清一著，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译 《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页。

⑩纪宗安、崔丕 《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关于近代日本对南洋及南洋华侨的调查和研究，早期综述可参见许云樵 《南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收录于李孝迁编校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464～472页，原载《文讯月刊》，1947年第7卷第3期。同可参考滨下武志 《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第五章 《帝国 = 植民地関係のなかの華僑——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日本の南洋経済政策》。连心豪 《1940年代初期日本南洋华侨政策初探——以日本的南洋华侨调查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1940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92～799页。

⑪《日本与南洋华侨》，上海 《申报》，1915年10月18日。相关调查研究如台湾總督府編印 《南洋ニ於ケル福建廣東両省移民ノ活況》；南滿洲鉄道東亜經濟調査局 《華僑》，1927年；外務省通商局編：《華僑ノ研究》，外務省通商局，1929年；企画院編：《華僑の研究》，松山房，1939年；斎藤俊一：《華僑之研究・第1編(暹羅之部)》，上智大学經濟研究所，1935年；小林新作 《華僑の研究：支那民族の海外発展》，海外社，1931年；外務省通商局第二課：《華僑の現勢》，1935年；等等。以七七事变为契机，1937～1941年间，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铁调查部分别刊印了《南洋叢書》《南洋華僑叢書》两套丛书。

⑫竹井十郎 《南洋は日本をいかに観る》，日本書莊，1937年，第12～13頁。

⑬转引自濱下武志 《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第185頁。

⑭纪宗安、崔丕 《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

⑮任贵祥、李盈慧 《华侨与国家建设》，载张宪文、张玉法主编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四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3頁。

⑯⑰林云谷 《动员华侨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8年，第2、25頁

⑱参考 「部報第16号」、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06032509800、台湾總督府刊行物(国立公文書館)」。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英领北婆罗洲、菲律宾等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关于华侨抗日热情高涨的原因，当时日本方面的相关调查认为除了华侨的“爱国心”外，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指派专员在华侨当中进行煽动宣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反宣传”。参考「南洋華僑事情送付の件」、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1002261500、大日記乙輯昭和1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⑲参考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变と華僑》，1939年，第1、3頁。

⑳南洋協會編 《南洋華僑》，南洋協會，1940年，第189～190、169～170頁。

㉑「思想展覽会記録図鑑」、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06031112400、思想展覽会記録図鑑(国立公文書館)」。

- ② 参考林远辉、张应龙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3~414页。
- ③ 谢作民 《华侨对抗战的责任》，转引自费利文(Steve Phillip)：《华侨还是抗战之母吗？——论抗战早期的国民党和华侨动员(1937-1941)》，载杨天石、傅高义主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三卷：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67~985页。
- ④ 王志远 《站在国民外交最前线的侨胞》，《华侨动员》，1939年第17期，10~11页。
- ⑤ 具体活动可参考任贵祥 《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第八章“掀起国际援华大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⑦ 「時局情報宣伝資料皇国内外の情勢第2号」、[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06031107500、時局情報宣伝資料皇国内外の情勢(国立公文書館)]。同参考大阪 《大阪朝日新聞》1939年4月9日。
- ⑧ 「時局情報宣伝資料皇国内外の情勢第2号」、Ref. A06031107500。
- ⑨ 「対華僑宣伝方針(昭和一三. 六. 一三)」、[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15060361700、情報部常務部会書類(国民精神総動員)、対華僑宣伝方針(昭和一三. 六. 一三)]。
- ⑩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1945)》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12页。
- ⑪ 「支那事变ニ對スル宣伝方策大綱(昭和一二. 九. 三)」、Ref. A15060361500、情報部常務部会書類(国民精神総動員)昭和12年~昭和13年(内閣總理大臣官房総務課資料)。支那事变ニ對スル宣伝方策大綱(昭和一二. 九. 三)、Ref. A15060361500。
- ⑫⑬⑭ 「対華僑宣伝方針(昭和一二. 六. 一三)」、Ref. A15060361700。
- ⑮ 《滿州日日新聞》，1938年7月19日。
- ⑯ 「第一章 宣伝啓発/第一項 宣伝要綱/第二項 宣伝ノ様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130979700、支那事变ニ於ケル情報宣伝工作概要(情-12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⑰ 《董显光回忆录：日本的宣传战(原书第六章)》，《报学杂志》，1948年第1卷第2期，24~26页。
- ⑱⑲⑳ 「第一章 宣伝啓発/第一項 宣伝要綱/第二項 宣伝ノ様相」、Ref. B02130979700。
- ㉑ 《厦門共榮會設立趣旨書》(1938年10月19日)，载福建省档案馆、厦門市档案馆編《閩台關係檔案資料》，厦門：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 ㉒ 台北 《台灣日日新報》，1938年12月25日。转引自李向群主编《见证：1938年厦門日寇入侵厦門前后报刊史料汇编》，厦門：厦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294页。
- ㉓ ㉔ 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变と華僑》，第68、69~73頁。
- ㉕ 大阪 《大阪朝日新聞》，1939年4月5日。
- ㉖ 「5 支那事变ニ於ケル情報宣伝工作概要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85100、支那事变關係一件/輿論並新聞論調(A-1-1-0-30\_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㉗ 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变と華僑』，第6~7、68頁。
- ㉘ 「7 支那事变ニ於ケル情報宣伝工作概要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85300、支那事变關係一件/輿論並新聞論調(A-1-1-0-30\_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㉙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 编译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6~267页。
- ㉚ 吴廷璆主编 《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08页。
- ㉛ 参考井上祐子 《戦時グラフ雑誌の宣伝戦：十五年戦争かの“日本”イメージ》，第128頁。
- ㉜ 《广播年鉴》，1940年，转引自赵玉明主编《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 ㉝ 王美平、宋志勇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1895-194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8~329页。
- ㉞ 「東亞新秩序建設に關する宣伝方策大綱(昭和一二. 二. 一七)」、[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15060362400、内閣>内閣總理大臣官房總務課資料>情報部常務部会書類(国民精神総動員)]。

⑤④ 「東亜新秩序運動週間に関する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4120742800、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8号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⑤ 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変と華僑》,第69~73頁。

⑤⑥ 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変と華僑》,第69~73頁。中文译文摘自崔丕、姚玉民译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3~54頁。

⑤⑦ 具体可参考兴亚院为述职而准备的材料 《興亜院功績概要書》([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702800、对支中央機関設置問題一件(興亜院)/興亜院功績概要書第一卷(A-1-1-0-31\_4\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⑧ 台湾拓殖調査課編印 《支那事変と華僑》,146~147頁,中文译文摘自崔丕、姚玉民译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第99~100頁。

⑤⑨ 迅中 《关于东亚新秩序敌国輿論の一般》,《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10期,6~8頁。

⑥⑩⑪ 「4. 重要国策關係(支那事変中)/24 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に関する宣伝方針」、[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525200、支那事変關係一件 第四卷(A-1-1-0-30\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⑫ 「1. 「國際情勢と帝国の立場」と題する有田外相放送關係(所謂第二次有田声明) 昭和15年6月29日」、[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0020300、國際情勢ト帝国ノ立場ニ關スル有田外相放送關係一件(A-1-0-0-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⑬⑭ 臧运祜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6、255頁。

⑥⑮ 林庆元、杨齐福 《“大东亚共荣圈”源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89頁。

⑥⑯ 井上祐子 《戦時グラフ雑誌の宣伝戦:十五年戦争かの“日本”イメージ》,第213頁。

⑥⑰ 「1. 南方作戦に於ける占領地統治要綱案」、[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4060703800、南方作戦に於ける占領地統治要綱案 昭和16.3末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⑥⑱ 转引自连心豪 《1940年代初期日本南洋华侨政策初探——以日本的南洋华侨调查为中心》,第801~803頁。

⑥⑲ 「18. 南方占領地行政実施要領」、[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2965400、大東亜戦争關係一件/開戦關係重要事項集(A-7-0-0-9\_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⑳ 「10. 華僑対策要綱(昭一七、二、一四連絡會議決定)」、[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2971500、大東亜戦争關係一件/戦時中ノ重要国策決定文書集(A-7-0-0-9\_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㉑ 《長期建設指導国策要綱案(第三案)》,企画院,1939年,40~41頁。

⑥㉒ 爱德华·L·伯内斯著,胡百精、董晨宇译 《宣传》,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頁。

⑥㉓ 参考井上祐子 《戦時グラフ雑誌の宣伝戦:十五年戦争かの“日本”イメージ》,第208頁。

⑥㉔ 徐勇、臧运祜总主编,唐利国编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刊 思想战与文化宣传》(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頁。

作者简介: 吴婉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 李振武]